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图景

杨立川 郑 萍 等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西北大学传播文化研究丛书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图景

杨立川 郑 萍 等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图景/杨立川等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24-09309-4

I. ①延… II. ①杨… III. ①新闻事业史—中国—1935~1947 IV. ①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8095 号

西北大学传播文化研究丛书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图景

作 者 杨立川 郑 萍等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 8.7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9309-4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红色主题:延安新闻传播之价值追求与内涵解析	(1)
第一节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研究概述	(2)
第二节 延安新闻传播事业的红色主题与发展历程	(14)
第三节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事业的价值追求	(22)
第四节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事业的内涵解析	(28)
第五节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的当代意义	(34)
第二章 合奏:延安时期和谐多元的传播形态	(45)
第一节 延安时期的报纸	(45)
第二节 延安时期的广播	(49)
第三节 延安时期民间传播形态	(56)
第三章 交融:大众传播与陕北地方传播习俗的结合	(73)
第一节 陕北地方传播习俗特点	(73)
第二节 大众传播与地方传播习俗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79)
第三节 重构之后的民间传播形态及大众传播	(90)
第四章 延安时期来源多途的传播者	(102)
第一节 丁玲:从现实批判文学到革命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103)

第二节	周扬:从左翼文艺理论家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传播者·····	(107)
第三节	成仿吾: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到红色文化传播的领军人物·····	(112)
第四节	博古:从才华横溢的传媒实践者到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116)
第五节	陆定一:从宣传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家·····	(120)
第六节	傅英豪:从敌后报务员到红色广播创始人·····	(124)
第七节	杨兆麟:从敌后报纸编辑到延安红色电波播音员·····	(127)
第八节	西德尼·李敦白:从中国人民的朋友到延安新华广播的“洋”播音员·····	(130)
第九节	周文:从群众中走来的大众化新闻传播旗手·····	(133)
第十节	齐越:从报刊编译到中国第一位男播音员·····	(138)

第五章 独特的大众传播实践:中华大地前所未有的精神创造 ····· (142)

第一节	独树一帜的延安大众传播·····	(143)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	(156)
第三节	新的精神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	(167)

第六章 延安时期的红色民间传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升华	(173)
第一节 延安时期红色民间传播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	(173)
第二节 延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	(178)
第三节 红色民间传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185)
第七章 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观	(202)
第一节 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新闻职业道德原则	(203)
第二节 延安时期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218)
第三节 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观的形成原因	(228)
第八章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的特点分析	(240)
第一节 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具有中国“红”文化的特点	(241)
第二节 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文化特点	(243)
第三节 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文化特点	(250)
第四节 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在文化方面的开放思想与实践	(253)
注释	(258)
跋	(273)

第一章

红色主题：延安新闻传播之 价值追求与内涵解析

提要：贯穿于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的红色主题，体现在延安新闻传播的价值追求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伦理、生活方式、人格修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等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包括延安地区的新文化建设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性作用。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人。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延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奠定革命成功基础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新闻传播与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闻传播事业的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就十分重视新闻舆论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其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实践者，也是延安红色新闻传播实践的领导和参与者。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百分之九十的国家中进行的，而农民中的大多数“没有政治的兴趣”，只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因此，革命思想的导入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对此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人民的觉悟是不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¹他甚至这样强调报刊宣传与革命斗争的关系：“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²延安时期的红色新闻传播事业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与文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我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新闻理念初步系统化、理论化，大众传播机构的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这些成就是对建党以来我党新闻传播事业多年经验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它也奠定了建国后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基础。

在本书中，笔者将把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放置于文化学的视野下进行解读，从而描绘出一幅延安红色新闻传播的文化图景。

第一节 延安红色新闻传播研究概述

一、研究对象

在历史上，“延安时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般是指中

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坚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的工作中心转移到陕北延安的这段时期。从时间上看，指1935年底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直到1948年中共领导中心东渡黄河这一历史时期，横跨1935年到1948年约13年的时间。

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下茁壮成长，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1924年，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仅三年多的情况下，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的的民族、民主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书写出浓重的一笔，使民族、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如“四一二”政变、“七一五”事变等，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并使共产党失去了“合法”的地位，在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革命政策指导下，大量的革命义士被残害，中国共产党发展中遭遇严重挫折。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由地上转向地下，由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1928年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进行斗争。这样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史称“白色恐怖”的十年内战时期。

自1930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先后于1930年到1932年四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巩固了根据地的建设，扩大了自身的力量。1931年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逐渐变为民族问题。新生的红色政权要同时面对外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双重反革命势力。可是随着“左倾”思想在党内的蔓延，党

内部出现了危机。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也就是震惊世界的长征。

在红军长征期间，为解决长期以来影响我党生存发展的思想问题，红军在遵义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不仅纠正了“左”的思想错误，同时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1935到1936年间，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陕北，与陕北刘志丹红军胜利会师。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边区，延安则变成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政治中心。

延安时期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时期。延安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许多著名的报人、播音员、记者，新闻业务、新闻理论、新闻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文化建设事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对于大众文化的普及和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935年到1948年期间，由于国内复杂的社会形势和对外斗争局势，促使中国的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形式多样。学者吴廷俊认为“两极对立的政治势力，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各自都十分重视发展自己的新闻事业，因而中国便出现了两极对立的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新闻事业。这是1927年7月至1949年9月中国大陆新闻事业的基本格局，而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是这种格局的形成时期”³。学者李彬曾将这个时期概括为“三国演义”，即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和民间报业（包括文人报刊和商业报刊）三足

鼎立⁴。

“由于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党国政府，因而它是和以往的北洋军阀政府基本不搞官办的新闻宣传机构，而靠政客集团以民间形式办报和用收买办法控制民营报纸不一样，公开实现‘以党治国’，一方面大肆创办国民党的新闻机构，一方面公开禁止‘异党’报刊出版，把新闻事业纳入自身的机构统治之中。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明确宣称要‘为党之主义立言，为党的创建者之遗教立言’，要‘发扬党义和阐明遗教’，并‘不讳为本党主义之辩护人’。因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从一建立它的统治之日起，便开始建立包括通讯社、广播电台、报纸在内的新闻事业系统”⁵。19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反动的新闻传播系统“一报一社一台”（即创立于1927年的《中央日报》，1924年创办的中央通讯社和1928年开播的中央广播电台）形成，并在其严厉的新闻管制政策保护中顺利发展。因此其宣传报道对当时中国时局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受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影响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十分重视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十分重视党性，所以也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十分重视新闻媒介是党的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共产党从筹备时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更加重视新闻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办各种报纸，成立通讯社。正如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刊词所说的“不仅要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同时要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报纸，宣传革命的理论，传达真实的革命斗争的消息，建立在革命斗争中之一个伟大的推翻国民党的言论机关”⁶。红色根据地在人民政权领导下，红色新闻事业蓬勃发展。

在两极对立的大环境当中，那些原来靠“无偏无党”求发展的私营企业性报纸也无不受到制约，而不可能超脱。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红色新闻事业于艰难之中顽强发展和国民党的反动新闻体系形成的同时，中国私营企业性报纸也面临着严峻的选择，他们在选择中分化，在分化中发展。

毋庸置疑，上述新闻传播事业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新闻传播事业。1935年到1948年的这一时期，是我党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红色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延安时期红色新闻传播事业”研究渐成热点，出现了一些力作和有见地的学术观点。许加彪撰文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综述。他认为对延安时期红色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主要包括通史体例的研究、重点报纸的专门研究、延安时期的广播研究、新闻史人物和新闻思想研究等。⁷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切入点，产生的研究成果丰富而具有特色，彰显了研究的现实意义。本书力图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尝试以文化学的视角解读和认识延安时期红色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学又是怎样的一种学科研究方法？

1. 文化与文化学

文化是一个常见的概念，其意义也是十分宽泛。“文化”一词在中国的汉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后来，“文”又有了若干层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

体化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其二，由纹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的基础上，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起来，“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并由此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儒生编写的《易·贲卦·彖传》：“刚毅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系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转化而来。“天文”，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两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⁸

在西方，“文化”一词英文与法文为 culture，德文为 kultur，都是从拉丁文的 Cultus 而来。⁹Cultus 一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含义，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与中国古代的“文治教化”的内涵较为接近。

有关“文化”的定义是丰富而多样的，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尔在他的名著《人类历史哲学概要》中认为文化

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1) 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不容质疑的组成部分。

(2) 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

(3) 文化有明显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¹⁰

19 世纪，西方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更为明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这样认为：“文化是人类在历史经历中所产生的思想与事物的整个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从社会上学到的各种能力和习惯。”¹¹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德·威廉斯追溯了“文化”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认为“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上被使用：即艺术及艺术活动；习得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¹²

由于中西方科学体系与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在研究中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理论，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和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出发进行学术研究。在我国，文化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辞海》的定义：

从广义上讲，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成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它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

有民族性。通过民族的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史连续性的基础。无产阶级文化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和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实践经验而创造发展起来的。¹³

这个界定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出发，对文化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表述。同时也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习惯认识、习惯表达，是对“文化”一词比较全面、准确的定义。

文化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文化的学科。文化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学科概念。在阐述文化学的内涵之前，让我们首先区别“文化学”与“文化研究”这组概念。

文化研究是西方社会学研究批评学派的重要一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采取的一种批评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当代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研究。文化研究一直专注于社会关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专注于社会划分被赋予意义的方式。¹⁴在文化研究学者的眼中，文化被看作这样一种领域，其间阶级、性别、种族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都被自然化，都以（尽可能）隔断这些不平等与经济、政治不平等之间联系的方式被表述。文化研究是一种批评的方法，它关注的是隐藏在文化现象、文化文本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诸如文化霸权、文化斗争等。

而文化学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文化学是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科学和发展学科，是专门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科学、发展的原因以及动力、趋势的，是一门非常庞杂而精密的学科。¹⁵文化学的内涵包括了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方方面面，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等等。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学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二者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是社会学与文化学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着对方的不断发展。不

过，与社会学相比，文化学关注的对象具有广泛性，不但从宏观层面关注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及动因，同时也从微观层面考察文化的具体内容及影响。

文化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即文化的推进、提升、拓展和发展的方法。在本书中，我们尝试将延安时期的红色新闻传播事业放置在文化学的视野之中进行解析。

2. “新文化”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学界对于延安时期新闻事业的解析中，还甚少有学者采用文化学的视野进行解析。历史的研究应既注重历史细节、历史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而且要有一种宏观的视角来关注社会历史变迁的巨大影响。与编年体的传统史学研究、思想史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不同，文化学的研究取向更符合这一要求。因此，对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延安时期的红色新闻传播事业而言，文化学的视角是科学的方法。文化学的视角既关注着微观层面的文化现象，例如八路军在进行大众文化普及过程中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作用等；又从宏观层面上对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政治、经济紧密联系进行观照。

在本书中，笔者对于“文化”的理解，既不同于西方对“文化”的解读，与中国传统上对“文化”的阐述也有区别。作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了能够代表时代的发展特点和前进方向、并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之上。而在延安时期，这种文化，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当时的年代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先进文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最终取得成功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吸

收与借鉴西方优秀文化，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下，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凭借其所具备科学性的内容和与时俱进的品质，发展成今天时代主流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延安时期的红色新闻传播事业，正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和指导下，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十分注重文化事业与革命事业的相互联系，认识到文化对于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巨大作用。顺应中国新文化发展的要求，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创始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为我党的新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以白话文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更是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诞生打下坚实的基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也特别注意报刊等新闻传播工具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先后创办了很多的报刊杂志，诸如《向导》、《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早报》、《热血日报》等等。即使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也没有忽视文化事业的建设，在当时各大主要报刊杂志队伍中，都活跃着共产党员的身影。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